

天主教教宗本篤 16 世的中國政策探討

銘傳大學 師培中心副教授 孔令信

論文摘要： 中梵是否建交？何時會建交？一直都是國人與世人關心的話題。其實梵蒂岡早就準備好了，隨時都可以與中國對談讓關係正常化。只是還是有很多問題來自中國與中國教會，使得這個「中國問題」變得格外複雜。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 1995 就以行動「面向中國」，2001 年 10 月 24 日還向中國道歉，可是他的面向中國在他蒙召時還是無法實現。他的繼任者—教宗本篤十六世，不但接續「面向中國」還更積極地發展出「前進中國」，在 2007 年 5 月 27 日更發表了《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談到中梵關係可以透過對話解決，特別是主教任命權也可以協商解決。而牧函最重要牧靈訊息就是中國教會地上與地下的合一共榮，進而以一個新中國教會向中國政府爭取自由。

合一共融的牧函訊息改變了中國教會現況，但「反解讀」也加深了不必要的心結，一時之間本篤十六世的「前進中國」反而曲折難行，這是梵蒂岡所意想不到，但教宗本篤十六世還是堅持，一直到最終的那一天。

本文主要在分析梵蒂岡的中國政策，特別著墨在本篤十六世最新的中國政策動向，透過分析提供討論與參考。

關鍵字： 面向中國、搶進中國、若望保祿二世、本篤十六世、教宗牧函。

ABSTRACTION: Does the Vatican-China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hen will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People in Taiwan and the world has always been a topic of concern. In fact, the Vatican has long been ready, at any time to talk with China to normalize relation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questions from China and the Chinese Church, makes this the "China issue" has become extraordinarily complex. .

Since 1995, Pope John Paul II take Action "face to China", October 24, 2001 also apologized to China, but he called for the Chinese when he still can not achieve. His successor - Pope Benedict XVI, not only continue

"face to China," even more active role in developing a "forward-China", in the May 27, 2007 also issued a "letter to Chinese Catholics," On Sino-Vatican relations can be resolved through dialogue, in particular the right to appoint bishops can be resolved through consultation. The pastoral lett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storal message on the official and the underground Church in China's unity and communion , and then to form a new Church in China that can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freedom.

The main theme of the Pope's pastoral letter is unity and communion, this great message changes the status of the Chinese church, but "anti-Interpretation" also deepened unnecessary knot, a moment Benedict XVI's "advance China" instead of twists and turns difficult, it is intended by the Vatican unexpected, but Pope Benedict XVI insists, until the final day.

In this paper, the analysis of the Vatican's China policy, special pains to Benedict XVI in the latest policy developments in China, through the analysis for discussion and reference.

KEYWORDS: Face to China, Forward China, Pope John Paul II, Benedict XVI, the Pope's pastoral letter.

零、前言: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面向中國」

2005年4月2日對梵蒂岡來說是一個關鍵的一天。

深受教友與世人愛戴的天主教教宗若望保望二世（*Ioannes Paulus PP. II*）蒙主恩召，這位第264任教皇，在位26年（1978-2005）。他原本是波蘭神父、主教、樞機，在選出教宗若望保祿一世時（註1），他參與了，沒想到33天後，這位年僅58歲的卡爾·沃蒂瓦（*Karol Józef Wojtyła*）獲選教宗，他以繼承方才過世的教宗名號為職志，成了若望保祿二世（註2）

註1.教宗若望·保祿一世（拉丁語 *Ioannes Paulus PP. I*，義大利語 *Giovanni Paolo I*），本名阿爾比諾·盧恰尼（1912年10月17日—1978年9月28日），教宗保祿六世於1978

由於他曾在共產黨所控制的波蘭牧靈，所以他對共產主義有深層的了解，他是強烈反對共產主義。在成為教宗之後，更大力支持與共產黨政權抗爭的人們，如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促成了波蘭與東歐日後的民主化，更重要的就是引發 90 年後的「蘇東波」風潮，加速了共產集團的崩解。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就曾說過，沒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鐵幕不會倒下。很多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也持有類似觀點。美國前總統雷根更推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結束共產專制統治的英雄之一」。儘管如此，1989 年的天安門學運卻沒有將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拉下馬來，六四鎮壓的坦克清場反而掃平青年學子的民主希望。中國還是一個封鎖的國家，它的人權與宗教信仰依然被國家所控制，人民依舊不自由。就在這樣的背景中，一向反共的若望保祿二世卻在 1995 年開展了「面向中國」的大轉變。

1995 年 1 月若望保祿二世訪問菲律賓，他在馬尼拉主持慶祝第十屆「世界青年日」彌撒，1 月 14 日教宗就近透過廣播向中國教會傳送了他的關懷與想法。主要的重點就是呼籲中國教會與羅馬公教的合一共融（The Call for Unity made in 1995）。（註 3）

（續）_____

年 8 月 6 日逝世。梵蒂岡召開紅衣主教會議，時任義大利 S. Marco 樞機主教的盧恰尼最後在四輪的選舉中出線。他於 1978 年 8 月 26 日上任，他也是首位拒絕接受傳承數千年的教宗加冕禮及教宗的三重冕，他選擇簡單的教宗就職彌撒。若望·保祿一世一直恪守他謙遜的座右銘，在他上任第一天進行的著名的「奉告祈禱」中，他的友善給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惜僅僅 33 天就去世了。他是歷任教宗中執政時間最短的人之一。

註 2.若望保祿一世是第一位使用雙名的教宗，他在〈奉告祈禱〉中解釋，這是為了向他的前任者，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以及保祿六世致以敬意。前者任命他為主教，而後者任命他為威尼斯宗主教以及樞機主教。他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在教宗名稱中使「一世」的教宗。在義大利，若望·保祿一世被教徒親切的稱作「微笑教宗」（Il Papa del sorriso）和「上帝的微笑」（God's smile）。卡爾·沃蒂瓦樞機主教在獲選教宗後除了沿用這個名號而稱為「若望保祿二世」外，更在首次於於伯多祿廣場與教友與世人見面時，一開口就用了流利的義大利文向所有在場人士問候，並謙稱自己是「來自遠方的神父」而立刻獲得現場熱烈的掌聲與信任。

註 3.在若望保祿二世發表的” Message to Chinese Catholics from Manila” 訊息中，教宗強調了：「Particularly important among these principles is the effective communion of all the parts of the Church with her visible foundation: Peter, the Rock」他籲請所有中國的神職人員盡可能尋求方法與教會中最重要與最有效的共融，那就是與伯多祿磐石所建立起來的羅馬教會合一。Cf. E.Wurth(2006) “*Papal Documents Related to China 1937-2005*” pp.208-209.

1996年他再度向中國大陸提出合一的呼籲，他在1996年12月3日聖方濟沙勿略瞻禮（Francis Xavier's feast），同時也是中國建立聖統制50周年與庇護十一世任命首批中國籍六主教70周年的紀念彌撒上（註4）。教宗再度發表他對中國教會合一共融深深的祈求與期待。（註5）可惜中國都沒有做出任何動作，讓教宗只能「在絕望中仍懷著希望」（hope against hope）（羅：4:18）

2000年1月6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羅馬祝聖了12位主教；中國的不合法主教也在北京南堂祝聖了5位未經羅馬教宗所批准的自選主教。雙方像似卯上了，讓中外都震驚，這次的事件讓教廷與中國的關係降到冰點。2000年10月1日，當教宗宣布把120位中華殉道者列入聖品，中國震怒積極地引爆反宣聖運動，報刊上大量刊載了抨擊這些殉道者與教廷的文章，一時之間「梵蒂岡」一詞與「帝國主義」畫上了等號。中國與教廷的關係跌到冰庫裡去了。

隨著若望保祿二世的年紀愈來愈高，他的心向著中國愈來愈熱切，他是歷任教宗中出國訪問最多的一位，而終其一生最渴望訪問的就是中國。他熱切希望訪問中國，更熱盼中國不要再孤立於普世教會之外。為此，教宗還表明，如果能達成這個「破冰」之旅，先得為教會「過去的錯誤」道歉，他也會本著福音精神甘心為之。只要能讓教友的信仰生活正常化就夠了！

註4.聖方濟沙勿略（1505-1552）是耶穌會創始人之一，他是最先傳教到麻六甲與日本的聖人，也被稱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為傳教士主保、東亞主保，他曾來中國準備要偷渡內地傳教，竟病死在廣東上川島，向著他深深遺憾不能到達的中國而亡。他的遺願還是由利瑪竇完成。中國教區實行聖統制，受到法國的杯葛，一直要到抗戰結束後1946年4月11日才開始實行。中國籍六位主教在1926年10月最後一個主日耶穌君王節，在剛恆毅主教陪同下到教廷，接受教宗庇護十一世的祝聖。若望保祿二世會選擇這三個與中國有密切關係再度發表對中國教會合一的呼籲，用意很深。

註5.若望保祿二世在這次談話中，對於中國政府期待很深，希望能與中國政府進行對話（dialogue），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管民事當局應該保證：一個基督徒可以在任何一種政治制度下過他的信仰生活，為了提供這個權益，首應尊重他的權利，還有尊重他能依著自己良心命令與個人信仰去生活。為了這個緣故，我再度向中國政府當局呼籲，我曾在很多地方說過的話，他們不應該害怕天主和祂的教會。真心地，我誠敬地要請求他們，順從真正自由，那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Cf. E.Wurth(2006) “*Papal Documents Related to China 1937-2005*” pp.211-217.

2001年10月24日，若望保祿二世正式向中國說：「我請求原諒」。他是在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10月24日舉行的《偉大的耶穌會傳教士和科學家利瑪竇到北京四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致辭作出道歉並呼籲中梵建交。（註6）

若望保祿二世在晚年所致力推動宗教「融合與對話」，一直到他逝世前二天，梵蒂岡還派出密使（比利時的丹尼爾樞機主教）赴大陸。他的「面向中國」政策雖說一再受到中國政府的阻礙，不過，他並沒有放棄任何一線希望。

終其一生，教宗保祿二世的「面向中國，合一共融」是有步驟的，先是改善氣氛，以利於合一的推動。而推動合一的最重要一步就是中國教會無論地上或地下，忠貞或愛國教友，能在同一個堂內祈禱共祭，一旦能祈禱共祭，就有可能在聖神的化工下進入真正合一。要做到這一點不能一廂情願，所以教宗才會特別強調對話與溝通。只是在這個階段中，中國雖然經濟崛起，不過宗教自由這方面還是停在老舊的文革階段。因此要真正的溝通就必須全面性，要官方也要和地下都進行溝通，不能僅與單方進行對話，還得全面都進行才有可能避免「加深分裂」。

至於最關鍵的對話，就是面對中國政府。教廷要與中國溝通，就得避免對抗，儘管有不同甚至有反對的意見，都必須避開不必要的衝突。只能用溝通與對話，即使有不同意見，還是可以做好朋友。換言之，教廷對中國所採取的是低姿態與溝通並進，爲了爭取到大陸福傳與教友的信仰自由，一切就是不要破局。

儘管面向中國沒有成功，但也並非全然失敗。梵蒂岡高層深切了解：交談是解決歧見的唯一途徑。同樣交談也是促教會內部合一的唯一途徑。中梵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建立關係而已，還有很多糾結、就像歷史性爭議、政治現實性……合一共融是教會對大公教會基本定義，這個定義是以羅馬教會爲馬首是瞻，在教會的聖統制上，同樣的最高權威還是來自教宗，這種堅持與中國對「一個中國」「一黨專政」來說同樣是站在對立的立場，甚至是很難溝通的。這也就是爲何中梵在過去二十五年來，不斷地接觸中，始終無法取得真正共識的主要關鍵所在。

註6：若望保祿二世反省四百多年來傳教士在中國服務的意義及局限，並就傳教士在向中國人傳福音中所犯下的缺失，向中國人民道歉。中國天主教官方與地下教紛表歡迎，韓德力撰文指出「他比以前任何一位教宗都走得更遠，而台灣的天主教也默默地接受以示全力支持。」而浙江地下教會一位教友表示教會若有犯錯就應道歉，但不能為了改善與中國的關係而道歉。他認為天主教會在中國沒有犯錯，故教宗不需道歉。他說：「我們地下教會當然歡迎中梵建交，這樣我們便可以自由地興建聖堂和舉行禮儀。不過，建交並不一定可改善公開和地下教會的關係，這問題需要雙方詳細討論。」

若望保祿二世已謝世，他的「面向中國」終成一個遺願，就向當年聖芳濟沙勿略面向中國一樣的悲情，可是兩人同樣的心思，都是想把基督的福音傳向中國大陸。沙勿略之後，出現了利瑪竇，而若望保祿二世之後呢？會是誰來圓滿他的夢呢？

壹、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前進中國」

2005 年 4 月 2 日對梵蒂岡來說是一個關鍵的一天。

4 月 2 日中歐夏令時 00:30 左右，梵蒂岡一位發言人證實教宗已經領受了病人敷油聖事/終傅聖事。但教宗拒絕上醫院，他會見了貼身的隨從人員，包括約瑟夫·拉辛格 (Joseph Ratzinger) 樞機。拉辛格樞機說：「他知道自己將要離世，並跟我做了最後的道別」。教宗還要求聽別人誦讀前幾日有關十字架苦路的心禱。

據神父 Jarek Cielecki 說，教宗死前最後說的一個詞是「亞孟」(Amen)，隨後就在他閉上了眼，享年 84 歲。國務卿索達諾樞機、羅馬教廷財務總管愛索馬洛樞機、教廷國務院副院長桑德里大主教等人先後趕到。此後樞機團長約瑟夫·拉辛格樞機和若瑟夫·董高樞機也進入教宗寓所，與他們至愛的教宗告別。

這天之後接下來便是選舉新教宗—梵蒂岡第 265 任的伯多祿繼承人，最後由 78 歲的樞機團長約瑟夫·拉辛格當選。拉辛格成爲新教宗本篤十六世，然而他會不會繼續若望保祿二世的「面向中國」政策？還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呢？

1. 新舊教宗的情誼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生前最得力的兩個助手一位就是國務卿安傑洛·索達諾樞機，另一位就是從 1981 年被他力邀到羅馬擔任信理部長的約瑟夫·拉辛格樞機。在外交折衝與赴外訪問的過程中國務卿安傑洛·索達諾樞機都是一流的好手。而另一個吃重的信理部，這也可以說是梵蒂岡組織中最吃力不討好的一個工作。

1978 年教宗保祿六世去世，梵蒂岡召開新教宗選舉祕密會議上，來自波蘭的沃蒂瓦樞機第一次與才在 1977 年 6 月 27 日晉升慕尼黑樞機主教的拉辛格見面。這一年先後兩次會議，在八月選出了盧恰尼出任教宗，即若望保祿一世；而十月時選出的是沃蒂瓦擔任教宗，他就是若望保祿二世。這推舉沃蒂瓦時，拉辛格不但自己投下一票並幫忙拉票。當選的新教宗在就職不久，就對拉辛格樞機說：「我們會讓你到羅馬來」，當時若望保祿二世就想任命拉辛格擔任教廷教育部長。不過，拉辛格婉拒了。他認爲當時還不是他離開慕尼黑的時機。

1981年若望保祿二世做出了「個人選擇」力邀拉辛格出任信理部長。拉辛格的一些同事對這件事做出了這樣的解釋：「這位波蘭教宗下定決心，仰賴這位德國神學家為他闡述現代的思想，然而，教宗作出這個決定時，拉辛格事實上已經從現代思想中撤退了。」（註7）

來到羅馬之後，拉辛格處理最著名的「戰役」就是教廷和南美洲的「解放神學」的對抗。讓他也獲得「坦克樞機」的封號。他在1987年9月發動攻勢。在演講中指出，如果南美洲沉醉於歐洲經濟科技成果，會「出賣其靈魂」，陷入「佔有文化」的泥沼，極有可能以馬克思主義姿態呈現出來。實證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已把世界推入深沉的災難和危機。因為他們所強調的物質獲得和公平分配，並未解決過去重大經濟問題。拉辛格提議，拉丁美洲應發展自己的「文化直覺意識和文化核心價值」，作為另一種選擇。（註8）

儘管解放神學在媒體推波助瀾下如火如荼地形成了龐大的聲勢，世界各地的也聲援不斷。不過，最後的結果卻是拉辛格獲得大勝，解放神學家如包福、古鐵熱、阿斯曼、蘇布里諾、席昆度等神父紛紛被迫離職，一些支持解放神學的主教也受到懲罰。一時之間，解放神學就像風吹過大地一樣地銷聲匿跡了！

不少人都注意到教廷這位信理部長，可是少有注意到他在這場戰爭中對抗的不只是神學上的爭議，他直接和馬克思主義對壘。這個經驗和他在大學教書時代見識到1968年杜賓根大學學生反權威的混亂行動中，有著不可磨滅的關係。那一年馬克思主義流行之風席捲各地，杜賓根大學也不例外受到影響，一時之間青年學子人人口不離馬克思，讓拉辛格更驚訝的是他所任教的神學院居然已成了趨向馬克思主義運動的「真正意識形態的中心」。他發現：「有一種受到意識形態影響的工具，是殘暴的、野蠻的、殘酷的。那種經驗讓我更清楚地理解到，如果一個人想要支持梵蒂岡二次大公會議，那麼就必須對信仰的濫用做出精確的抵制。」（註9）所以他對解放神學的打擊是不留情面、義無反顧的。

註7：拉辛格在梵二大公會議時，是德國科隆弗林斯樞機的首席神學顧問，大公會議期間以自由派聞名，後來卻愈變愈保守，而1970年連升三級，很快地成為慕尼黑樞機主教。他與若望保祿二世在選舉教宗時成為好友，他在大公會議的表現讓若望保祿二世印象深刻。參考約翰·艾倫著 宮高德神父譯（2007）《教宗本篤十六世》頁185。

註8：前揭書，頁220。

註9：前揭書，頁120。

另外，在這個學生反權威的混亂行動中，拉辛格改變了他在梵二會議時那種充滿自由主義的色彩。他發現：梵二大公會議時他支持教會內的那種自由化，勢必引發混亂，因為基督信徒對教會的直覺意識已喪失：所有人好像都關注大公會議的「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和「時代的標記」。爲了忠於整個大公教會，拉辛格感覺不得不走更保守的路線。（註 10）

他的保守態度與作風，讓他在若望保祿二世治理下的羅馬教會，關於基督宗教信仰的教理探討與發展，似乎少了「革新」這種感覺與氛圍。然而，他始終都是若望保祿二世的得力助手。一直到臨終之前，教宗還特別找他去道別。兩人的情誼之深也可從這裡看出。

2. 有沒有必要再「面向中國」？

若望保祿二世去世前二天，梵蒂岡還是派出了密使赴中國。這個密使就是比利時的丹尼爾樞機，他率團去密訪中國，除了考察與訪問教友之外，最重要的任務還是和中國教會連繫，同時試著與中國政府接觸。（註 11）教宗的故世當然是世界大事，中國教會的代表團也獲邀參加在聖伯多祿廣場舉行的殯葬彌撒。這也是中梵直接接觸的一大良機。新教宗雖然還未選出，但是若望保祿二世的團隊還在運作，相關人員自然很期待這次的對話。

不過，與梵蒂岡有正式邦交的中華民國政府陳水扁總統表明了要參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喪禮，在獲得義大利核發禮遇簽證，展開了「和平追思方旅」。2005年4月8日陳總統和各國元首齊坐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教堂廣場，代表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全程參與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追思彌撒，這也是中華民國總統第一次訪問梵蒂岡，更是首次踏上歐洲土地。

在獲知中華民國總統要參與教宗的殯葬彌撒，中國政府向義大利與梵蒂岡表達強烈不滿，還要求義大利應從「中義關係大局出發，採取切實措施，避免類似事件發生」。而中國更因此而取消大陸代表團赴梵蒂岡弔唁。

註 10. 參考約翰·艾倫著 宮高德神父譯（2007）《教宗本篤十六世》頁 129.

註 11. 依據法新社引述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指出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過世前二天，奉命往中國的就是丹尼爾斯樞機主教（Cardinal Godfried Daneels）到北京和中國負責社會與宗教事務的副總理回良玉在中南海會談。該報指出，這是數十年來，中共領袖首次和天主教領袖在中國領土會談。

當時主事的就是樞機團團長拉辛格，有鑑於當時有太多的媒體，引用不同樞機的看法談論教會大事（重點多半鎖定在新教宗的人選上），因此他要求樞機主教們不要再接受外界的採訪，結果卻引起不少人抗議。面對一百多位樞機的不同意見，教廷最後只能提醒他們謹守聖訓，不要忘了在十字架前所許下的誓言。

若望保祿二世的喪禮，給台北爭取到一次向國際發聲的機會，相對地北京表達了強烈不滿，新選出來的教宗如何來收拾這個中梵之間的僵局呢？是否還是要繼續「面向中國」呢？

貳、本篤十六世「前進中國」政策的形成

1. 新教宗本篤十六世就職大典

新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就職彌撒在 2005 年 4 月 24 日上午 10 時於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舉行。他在就職演說中，呼籲全球基督徒團結，還特別向猶太人問好，本篤十六世認為猶太人與基督信徒共同享有同一份精神遺產。他也向其他信仰的追隨者及無信仰人士致意，向他們保證會繼續與他們為全體人類的福祉展開懇切及誠實的對話。5 月間本篤十六世首次接見各國駐教廷使節團，當著這些大使們毫不諱言地表示希望與尚未和教廷建交的國家建交。

顯然，本篤十六世決定繼續執行若望保祿二世的「面向中國」政策，同時他的口吻顯示出他是有決心的而且更具體要和「無信仰人士」對話，進一步地要和尚未與教廷建交的國家建交。這些都表示他的政策將比過去「面向中國」還要積極。這和他在信理部主導對抗「邪說異端」強硬的態度有點類似，他會全力以赴，毫不妥協；但是他所考慮的不再是「打擊異端」，他站在教宗的高度所看的是基督福音的傳播，而更重要的是基於對上千萬中國大陸天主教徒的關心。本篤十六世一就職就顯現出他對推動與中共政權交往的行動與決心。本篤十六世「前進中國」的政策已經浮現。

中國對新教宗的就職與談話，沒有做出回應。主要原因應該還是對梵蒂岡在舉辦若望保祿二世喪禮時，邀請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與會，表達不滿與抗議。

2. 2006 年五位主教任命的衝突：

本篤十六世對中國的動作真的非常積極與主動，他在 2005 年 9 月初，公開任命四位中國大陸境內的主教為全球主教會議成員，邀請他們出席 10 月在梵蒂岡舉行的會議。四位主教之中有經雙方承認的，也有未得中國當局認可的。其中

更包括了西安主教李篤安。他曾被認為是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默存心中，秘而不宣（in pectore）的準備提升為樞機主教的人選。（註 12）

最後，在中國的刻意攔阻下，四位主教都無法成行，但是，陝西省鳳翔教區李鏡峰主教親自發函給教宗表達感激之情，而其以拉丁文書寫的函件也在會議席上宣讀。在氣氛上，中梵關係明顯地大有改善。

就在這種氣氛下，沒想到 2006 年 4 月至 5 月時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出現大動作，連續任命五名主教，包括 4 月 20 日任命徐宏根為蘇州教區主教；4 月 30 日與 5 月 3 日，分別任命馬英林和劉新紅為昆明教區及安徽教區主教。另外，5 月 7 日任命裴軍民神父為遼寧教區助理主教。5 月 14 日又再任命閩東教區副主教詹思祿升任主教。在此五項任命中，馬英林、劉新紅及詹思祿三人的任命受到教廷的強烈批評。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5 月 14 日從羅馬報導，北京方面的最新舉動使教宗本篤十六世非常震怒。因為這裡除牽涉到的就是教宗對各地主教的任命權，另外還涉及到中梵之間的建交問題。

事實上，此之前北京與梵蒂岡建交祕密談判原本進行順利，教廷甚至暗示已做好與台灣斷交的準備。中梵雙方都知道對方在世界的巨大影響力，也很清楚改善關係後對雙方的巨大好處。雙方建交時間表幾乎都已確定，要在 2008 年互換大使。（註 13）也正因如此，雙方在即將建交之時，卻突然爆發出愛國教會這樣大動作，讓雙方關係急轉直下。使本篤十六世的「前進中國」計畫立刻破局，讓這位新教宗怎能不生氣？

註 12.教宗曾在 2003 年挑選了一位祕密樞機主教，但人選祕而不宣。以往，教宗曾經有這種做法，任命身在教會遭受壓迫的地區教會中人為樞機。不過，梵蒂岡表示，若望保祿二世生前都沒有透露這位所謂的「默存心中」（in pectore）的樞機主教的身分。像上海教區主教龔品梅 1979 年被委任為樞機，就是由教宗默存心中，直到 1991 年才公布

註 13：2006 年 3 月 25 日梵蒂岡外交部長拉約洛周六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採訪時表示，教廷與北京當局建交「時機已成熟」。他並證實，教廷準備從台灣撤離大使館。而赴梵蒂岡榮升樞機主教的陳日君則 3 月 21 日在機場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表示，希望中梵建交愈早愈好，最好可以在北京主辦 2008 年奧運會前建交，並希望自己可以在當中扮演顧問角色。3 月 24 日香港新任樞機主教陳日君在羅馬暗示，梵蒂岡在任命中國羅馬天主教會大主教的問題上可能同作出妥協，以便掃清梵蒂岡和北京全面建立正常關係的最大障礙。

事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在接受媒體談話，表示「中國天主教會今天欣欣向榮，是中國長期以來推行自選自聖的結果」。(註 14) 而中國政府在五位主教任命案引發與教廷之間的「衝突」中，仍然表示，只要梵蒂岡斷絕與台灣的邦交以及不干涉中國的內政，就可以復交。兩廂對照，顯示中國內部在對梵蒂岡建交的問題上矛盾未解。有人刻意要破壞這個雙邊談判，中國再度退回到最原初的立場，繼續堅持「自選自聖」主教。

3. 「前進中國」的具體推動小組

儘管五位主教任命衝突讓中梵關係突然了煞車，在本篤十六世的想法與理念中，「前進中國」一定要有一個具體、可行的步驟與方案。而推動這個「前進中國」一定要有一個小組來討論、籌畫與執行。

在後來的本篤十六世簽署發布的《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信函（下簡稱《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其中有解釋信函的寫作相關問題中，談到這封牧函完成過程，就曾提到：

「一個由中國問題專家、羅馬教廷負責中國天主教會事務的神長們所組成的，十分精簡的專門委員會，全面地、細緻地分析闡述了各種似乎最能突出反應中國教會生活的問題。當教宗本篤十六世決定于二〇〇七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召集一些包括中國教會的神長們參加的會議後，上面提到的委員會就著手籌備一份文件，旨在推動就各種問題進行的廣泛討論，從與會者處收集實用的說明指教，從而為中國的公教團體提供一些可能的神學-牧靈的指導。親臨最後一次會議的教宗，在作出其他指示同時，決定親自致函中國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與平信徒。」(註 15)

註 14.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劉柏年，針對五名主教任命案所引發中梵之間的「衝突」接受媒體訪問表示愛國會計劃任命更多主教，而新主教必須「愛國」。劉柏年說，中國的新主教必須信仰虔誠並且愛國，否則中國教會將蒙受損失。他強調內地堅持自選自聖主教的做法，因此天主教才得到迅速發展，他稱此為「天主的安排」、「神的指引」，「自選自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遞福音的唯一正確道路」。劉柏年是中共黨員，陳日君就說過：「中國管理教會的方法真的是"不正常"(abnormal)。劉柏年他還在所有主教之上，這是不可能容許的。」參考 2005 年 5 月 17 日基督日報與 2007 年 7 月 6 日多維新聞。

註 15：參考本篤十六世發布《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信函，(Nota Esplicativa) -(Versione Tradizionale) 「信函解釋」部分，教宗牧函全文中文版請參考輔仁大學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網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archive_documents_Benedict_XVI_for_China.html

在這段說明中，我們看到了兩個重要訊息，一個就是本篤十六世有一個「前進中國」的小組，幫他負責處理中國問題，另一個就是教宗本人親自領導這個小組，甚至自己主動地要提筆寫信給中國教會。可見得他是如何重視中國問題與積極想要謀求解決。

教宗最初的「前進中國」政策小組成員就是中國問題專家與教廷負責中國事務的神長為核心，主要的還是國務院負責中國事務的相關神職人員為骨架，也就是三十位教廷國務院、聖座萬民福音傳播部官員，最初以國務卿索達諾樞機為首，2006年7月後由國務院長貝爾托內樞機主教(Card. Tarcisio Bertone)接手領軍（註16），這個團隊提供本篤十六世所有關於中國問題決策時的相關資訊與中國可能反應的研判提供給教宗本人參考。另外這個小組也負責幫忙協助教宗撰寫相關文件。

至於小組成員中的中國問題專家，韓德力神父在〈由中國觀察者到中國教會使命的伙伴〉一文中，談到香港的胡振中樞機主教，於1980年10月成立了聖神研究中心，並開始出版一份刊物《鼎》，培養不少對中國教會問題的學者專家。這些學者專家經歷過70年代中國與世界的歷史演變後，由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研究」有所突破，愈來愈多的討論，就像觀察中國的基督徒對中國狀況的矛盾解讀，最著名的就是勞達一(L. Landany)與懷德海(Ray Whitehead)的對立。而天主教一些傳教修會紛設立研究小組，1974年還舉辦了Bastad及Louvain會議，與會學者提供中國近代教會史珍貴資料。在這些學者中最受矚目的還是韓德力神父。（註17）

註16.教宗2006年6月22日任命意大利樞機主教貝爾托內，接替索達諾成為教廷國務卿。索達諾擔任教廷國務卿達16年。由教宗本篤16世任命71歲意大利樞機主教貝爾托內出任教廷國務卿。

註17.中國教會問題評論專家維斯特(Jean-Paul Wiest)指出，其實，官方承認的教會，以及所謂的地下教會之間的所謂「差距」已經越來越沒有意義。他說，在中國，其實雙方之間已經有很大程度的和解。香港聖神修院《鼎》雜誌執行編輯林瑞琪表示，其實在教會層面上，梵蒂岡與中國教會之間不存在分歧。

韓德力是比利時魯汶大學南懷仁文化協會的主任，他曾在台灣投入非常多的心血於福傳工作，1974年他在羅馬擔任聖母聖心會的副總會長，開始注意到中國大陸的重大改變與發展。1982年創辦了「比利時魯汶大學南懷仁文化協會」，促進大陸教會與比利時教會的交流，協助並陪伴比利時丹尼爾樞機，接受中國政府邀請到中國國訪問並在修院作演講。在2006年時韓德力訪中國大陸已四、五十次，並在各大修院教書，還到各教區作牧靈訪問。對中國教會有相當深入的理解。參考南懷仁文化協會編（2006）《中國教會的今天與明天》頁13-18與頁47-69。

有了專門委員的協助，教宗本篤十六世接著就在 2007 年 1 月 19-20 日召集了中國問題會議，這裡邀請參與的有台灣的樞機主教單國璽，還有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澳門主教黎鴻昇等教區的相關神長們，值得注意的是單國璽樞機代表台灣，這是在處理與中國建交時最敏感的一塊，而台灣教會從 1985 年被若望保祿二世邀請加入「橋樑教會」之後，受到兩岸對立的現實因素限制，無法直接有效地對中國大陸發生巨大影響。不過，單樞機還是代表台灣發聲，然而，明顯地台灣教會的聲音很難阻擋「前進中國」的聲浪。（註 1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扮演「橋樑教會」的香港教會在 1997 回歸中國之後，由於鄧小平喊出「一國兩治」保持現狀五十年，讓香港頓時成為可以影響中國教會的重要媒介，香港樞機陳日君又是敢於說話，不怕得罪中共的主教，本篤十六世的中國問題小組自然不會將陳樞機擱置一旁。陳日君在 2006 年 3 月 24 日晉升樞機主教，在這段期間他不斷地釋放出中梵即將復交的訊息，並表明願意為中梵建交做協調與溝通的工作。不過，中國對於他的「反共」立場顯然還是有所保留。幾次與大陸愛國教會對手經驗與風波，讓陳日君的角色變得很怪異。（註 19）

註 18. 1995 年 8 月 5 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更在接見台灣主教團時，向他們說：「大家都要行動，大家都要轉向基督，祂召叫我們合一共融。每個人都要探尋引人走向修和的途徑，每個人都要將自己整個交出來，他的過去，他英勇作證的時刻，他軟弱的時刻，他現在的痛苦，以及他對更美好的未來的期望。」對於教宗歷來籲修和合一，台灣的主教們對教宗的這番苦心，當然能夠理解。所以在 1985 年時就回應了教宗的籲求：「一九八五年，教宗清楚地呼籲台灣教會合作，成為『橋樑教會』，協助他重新建立與大陸教會的聯繫，於是當台灣主教赴羅馬述職正式向教宗提出：『聖父，關於大陸教會，只要有益於天國在中國的決定，我們接受您的決定。』教宗就發表了這些言論。主教們的話給台灣教友一個正確的解答。主教和其他中國人一樣愛國，所以我想，如果外交上轉為承認北京，他們也不會支持。可是他們瞭解中國大陸信仰生活正常化，是教宗最關心的事，在這方面，他們一定支持教宗。這個範例可以讓所有台灣教友都能遵循。」

註 19. 2006 年 3 月 10 日陳日君被擢升為樞機時，劉柏年就批他不擁護中國的社會制度，也不支持社會主義。他被梵蒂岡任命為樞機，在大陸受到多方質疑。陳日君反過來指責劉柏年的言論胡說八道，反映他害怕中國和梵蒂岡關係正常化。2006 年 5 月 17 日劉柏年接受《東週刊》訪問時透露，他與陳日君本是朋友，但在 2000 年時當他欲向陳日君商借教理翻譯時，但至原文是聖教會早就擯棄共產主義的二四五二條，兩人便出現分歧，劉柏年希望把其刪除，「我們傳福音，不是搞政治，不是推翻政權，相信通情達理的人都都會認真考慮。」但劉引述當時陳日君的反應為拍桌大罵：「我就是要讓所有中國人知道這條！」最後當然也不能借得英文版教理。兩人自此爭拗漸深。陳日君在 2007 年 7 月 1 日在香港參加了支持普選的遊行。7 月 2 日劉柏年向香港傳媒表示，陳日君的舉動破壞中國和梵蒂岡的信任。陳日君則不作回應。

首次中國問題會議最重要的決定有兩個，一是本篤十六世決定自己親自寫信一封信函給中國教會，這封《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很快就在於 2007 年 5 月 27 日發出；另一個就是因著這封牧函的主旨特別成立了「中國問題研究委員會」，定期開會研商處理中國教會相關政策與問題，本篤十六世每次都會親自與會。(註 20) 與會者包括教廷 2007 年成立的專門委員會成員、教廷各個部委及中國問題專家，這是教廷關於與中國關係決策的最高級別的會議。這些成員就是教宗推動「前進中國」的最重要小組成員。

4. 2007 年 5 月 27 日發出《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

本篤十六世會急著在召開 2007 年 1 月 19-20 日中國問題會議之後，不到半年時間內，就在他的中國小組協助之下完成了《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他之所以這麼急，就如他在 2006 年 3 月 28 日時所表示的，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把沒能踏上中國大地視為最大遺憾，他希望自己能在合適的時機訪問中國。換言之，本篤十六世把「前進中國」視為他上任最急迫的重大任務之一。

然而前進中國最大的問題，不在台灣。台灣問題在梵蒂岡這邊，正如國務卿索達諾樞機在 2005 年 10 月 25 日就以「只爭朝夕」的姿態表示，梵蒂岡希望盡早與中國建交，一旦中國同意，梵蒂岡準備當晚或翌晨就把大使館遷到北京，因為畢竟「中國數百萬天主教徒的精神需求顯然比 30 萬台灣天主教徒的需求更加迫切」。(註 21)

前進中國最大的問題，也不在梵蒂岡。所謂主教任命權的爭議，在教宗本篤十六世這邊，早就釋出善意。在 2007 年 7 月北京主教李山的任命就是在教區投票之後獲選，經中國政府同意，而梵蒂岡主動批准而完成。這就是循「越南模式」而改良，成了「中國模式」，解決了從 1951 年以後爭議最多的主教任命問題，這也無形地「保住了教宗任命主教的最高神權」，當然也表明了：中國默認了教宗的地位。

註 20.最近一次教廷中國問題研究委員會於 2010 年 3 月 22-24 日在梵蒂岡召開。這是自 2007 年成立以後，第三次開會，這次會議的重點在於：希望中國的主教致力於促進全體天主教徒在合一、信德和生活的成長，避免違背與任命他們為牧者的教宗共融的行為(如舉行聖事、祝聖主教、參加會議等)其次，與中國政府當局相互尊重和開放的對話，能夠克服目前的困難，達致有利於天主教會及社會共存的共識。台灣方面參與這個中國問題研究委員會的除了單國璽樞機外，還有新竹榮休主教劉獻堂。

註 21. 這是索達諾樞機在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利瑪竇會議中心啟用禮上，就中國問題回答記者時重申教廷立場。中梵一旦建立關係，教廷便中斷與台灣的邦交，他強調，唯一條件是中國必須尊重宗教自由，以及給予梵蒂岡如同其他國家一樣的同等尊重。

前進中國最大的問題，還是在中國政府與中國教會這邊。可是中國這邊的問題卻是中國政府是主管所有宗教的最高機構，在中國的天主教會中是有三個大區塊，一是公開教會（open），一是官方教會（official），一是非正式教會（underground），公開與官方教會兩者組成了天主教愛國教會，約有 560 萬教友，相對地下教會約 500-600 萬教友。（註 22）前者領了中國政府的薪水，為中國共產黨服務來管理中國天主教會，多少年來就是在執行打壓廣大的後者，讓這些非正式教會教友多少教友的家破人亡，更重要的是打著愛國的名號清除異己，形成地上／地下教會「不共戴天」的歷史對立。兩大教友團體的對立問題既然如此繁複又難解，羅馬教會想要與中國教會修和合一，顯然不是用口號就可以解決。前提就是要讓中國教會本身的分裂能夠解決，先從內部的修和合一，也就是共融共祭開始做起。這也就是教宗本篤十六世為何要寫這封《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重要的前提。

回顧大陸官方成立公開的愛國教會之後，1988 年河保定教區地下主教范學淹，就指稱這些官方的主教為裂教徒，並寫下「十三條指示」，重點就是在「嚴厲警告他的信眾，不要參加公開教會的彌撒，說他們若參加，就會犯大罪。」十三條就是指引教友對付「愛國會」的基本立場，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地下教會的教友們依舊遵照這樣的指示。（註 23）而大陸官方幾位不合法的主教後來向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申請並獲得認可，「這證明他們並非裂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認為「十三條指示」太嚴苛，於是在同年由教廷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董高樞機傳達他的「八點指示」以做緩和。

註 22. 中國網刊出「中國天主教觀察」依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統計，官方與公開教會教友人數 2008 年時約 560 萬人，推估地下教會約 300 萬左右。而香港天主教聖神研究中心所出版的雜誌《鼎》2008 年 11 月底調查統計，中國天主教教友（含地上與地下）共 1200 萬人，若是準確的話，地下教會成員應該 640 萬人，

註 23. 1951 年 4 月 12 日，教廷任命范學淹神父為保定教區主教。6 月 24 日（聖若翰誕辰瞻禮），范學淹神父在漢口聖若瑟主教座堂接受祝聖，發誓絕對服從聖座、服從教宗，至死不離開中國，誓死不離開他的教區。1988 年 1 月 3 日范學淹主教向一位來訪者（正定教區的牛伯鐸教友）回答關於天主教愛國會的問題答問被整理成《十三條》，在中國天主教會內（不僅在地下教會）廣泛流傳，各地教友紛紛響應，抵禦「愛國會」的浪潮一浪高一浪。稱愛國會神父是分裂教會，已經喪失神權，天主教友不可參加由愛國會神父主持的彌撒或向他們領聖體。受其影響，甘肅平涼教區馬驥主教也發表《我的聲明》，也在中國天主教徒中引起轟動。中共對范深惡痛絕。1989 年 11 月 20 日，中國大陸天主教各地忠貞的主教及代表都聚集在陝西三原教區高陵縣，秘密成立「完全接受教宗的領導，維持其與整個天主教會的徹底共融」的中國大陸主教團，當時范學淹被軟禁而未能出席，在眾教長一致推舉下，當選第一任團長，成為地下教會領袖。晚年，中共對他施酷刑，1992 年 4 月殉道。遺體被丟在聖堂門口，教友 15 萬人次來弔祭，4 萬人送葬。

換言之，在若望保祿二世時代，他在處理中國問題時，「八點指示」一直是他最基本的依據。到了 90 年代末，中國教會大約有九成官方主教被教廷認可，幾位地下主教及官方主教也都確信沒有裂教，「他們期待羅馬正式說明，以鼓勵兩個教友團體共同舉行聖祭」。兩大教會對立情勢有所緩，「八點指示」是否有必要調整？教宗本身在 1995 年已經朝「面向中國」政策上推進了，所以教廷是否還會有新的指示來取代這個「八點指示」？也成為大陸教會，特別是非正式教會的教友們更是關心。

然而接下來幾年在大陸教會中出現：「八點指示不再適用」的傳言，有人卻又發一信，指該文件仍然有效，再度引起困擾，「這是否意味中國大陸內確有裂教存在？」當然這也造成更多疑惑與不安亟待羅馬教會高層的話，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審慎研究大陸教會情況之後，認為跨越『八點指示』情結的時機成熟了，他的這封牧函便是給等待已久的人們一個清楚的答案。」（註 24）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中國教會本身的分裂一直都在，對立這麼多年，一直都是各忠於各自的天主，在地上的，他們的天主就是共產黨；在地下的，他們的天主就是天主，他們的教會是和羅馬共融與合一的。而當梵蒂岡願意放下或調整她的作法，相對地中國這邊，卻不但沒有接受，內部的矛盾與糾結反而在此時相互碰撞，讓歷任教宗所期待的與大陸教會合一共融之路，反而走得更曲折。

儘管如此，本篤十六世的個性與決心顯示他是不會放棄「前進中國」的，因此，他的《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也就是他在處理中國教會問題的最基本依據。

5. 《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的基本內容：

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的基本內容：
問候：向中國天主教徒問候。其次他談到寫信的目的：「我很想向你們表達我對你們親切的關懷。」而牧函「旨在就中國教會生活和福傳事業提出一些指導」。

第一部分 教會現狀——神學方面

全球化、現代化、無神論：

在你們的國家裡，宣講被釘死又復活了基督也是可能的，祇要你們忠於福音，與伯多祿宗徒繼承者和普世教會共融，就會知道將愛與合一的標誌付之行動。

註 24. 參考韓德力神父發表於《教友生活周刊》2007/9/9 第 2724 期第五版的一篇〈忠心執行教宗致中國信眾牧函的精神與意義〉

相互尊重及建設性的對話：

我深知，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關係正常化需要時日及雙方的善意。至於教廷方面，始終準備著協商，這是為克服目前的困境必須的。... 但是，教會亦同樣清楚要求國家在真正尊重宗教自由的前題下，保證天主教教友能完整地生活他們的信仰。

地方教會在普世教會內的共融：

在教會裡沒有一個人是外人，人人都是同一個宗族的子民、同一個身體的肢體。由主教及司鐸品位保障的聖體聖事，是聖事共融的鎖鏈。

教會內部之緊張現象及分裂：

教會的歷史告訴我們，真正的共融必經痛苦掙扎的修和才能達成寬恕與和好。

教會團體和國家機構：在真理和愛德中生活的關係：

落實「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原則」，與教會道理是無法調和的。而天主教會自古的信條就是「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

中國主教品位：在每一個國家裡，所有合法的主教們依教會法制定規章，經由聖座批准後，得成立為一個主教團。它是為表示一國內主教弟兄間的共融、並為一起研討其國內某些教義和牧民上共有的重要議題，然不干涉各主教在其教區職權上的自主性。此外，為了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合作，每一主教團要和地方政權維持適當及有益的往來。當然，在信仰和恪守信仰生活（*fides et mores* 信仰和道德、聖事生活）等純屬教會職能範圍的事務上，主教團不能屈從任何政權。

主教的任命：正如你們大家所知道的，主教的任命是聖座與貴國政府關係中最敏感的一個議題。一方面，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政府當局關注那些將發揮地方天主教會團體領導和牧人重要作用、並在社會中發揮影響的人選，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聖座也特別關注主教的任命，因為教宗任命主教，是教會合一和聖統制共融的保障。所以，這事有關教會生命的核心。

第二部分 牧靈生活指南
聖事，教區、堂區之管理
教省

教會團體
司鐸
聖召和度奉獻生活者的培育
平信徒及家庭
成人慕道
傳教聖召

結語

特權和牧靈指南之撤銷：因考慮到今日中國教會在某些方面已有了正面的發展；其次，因聯絡來往已更為方便；再者，有不少主教和司鐸所提出的要求，我乃決定以本函撤銷鑒於艱難時期牧靈的特殊需要而賦與的「所有特權」。同樣，以往及最近頒布的所有牧靈指南，也全部撤銷。今後，道理原則的應用全按本函的新指示處理。

為在中國之教會祈禱日
祝願（註 25）

參、前進中國的問題與修正

1 對《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的質疑與導讀：

這封牧函在結語部分撤銷了地下教會「所有特權」，這是行之有年的若望保祿在艱難時期牧靈的特殊需要而賦與的「所有特權」，也是地下教會與羅馬教會忠貞合一的最重要連結，一旦取銷，勢必會引發爭議。同樣教宗也撤銷了以往范學淹的「十三項指示」與若望保祿二世的「八點指示」等，這也是引發爭議，特別是對地下教會成員，頓然失去以往與官方愛國教會相處的原則。同樣台灣教友這部分，對於這封牧函，最大的疑慮還是：教廷是否正在加速與中國建交呢？.....

在眾多質疑、疑慮之下，正好韓德力神父寫了一篇〈開啟中國教會歷史的新篇章—對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國教會牧函的反思〉的解讀，（註 26）以下我們試著整理其中的內容，其中也包含了韓德力自己多年在大陸教會與官方和地下教會成員接觸所看到與經驗到的一些觀點，對這封信函的理解幫助甚大。

註 25.同註 15.本文僅摘錄部分重點內容。

註 26.韓德力神父先後寫了〈開啟中國教會歷史的新篇章—對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國教會牧函的反思〉及〈忠心執行教宗致中國信眾牧函的精神與意義〉兩文，一方面為教宗牧函做深度解讀，一方面也安撫台灣教友的疑惑與焦慮。

首先，韓德力對教宗本篤十六世牧函的解讀是：「這封牧函從內容上看非同尋常，因為它對二十年來導致中國教會內部分裂的一些炙手的牧靈問題作了明確的回答，在過去一切令人困擾的討論之後，唯有羅馬才能加以澄清。我將教宗的信，理解為如下所述：中國天主教會有一個而且她是忠於聖座的。兩個團體的主教、神父可以共祭，但是教宗鼓勵他們首先以信仰的宣誓來表達他們之間的合一。教會在地下生活不是正常的情形。現今沒有理由在中國繼續持守一個地下教會團體。因此，教宗收回過去賜予中國地下教會團體的所有特權。中國教友也可以參加官方教會團體的司鐸主祭的感恩祭。」（註 27）

韓德力的觀察是：「居住在偏遠農村的大多數中國教友關注的是別的問題。對他們而言，幾十年來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參加『公開』（官方）教會團體的彌撒？如果我們參加了，那麼我們是否如我們被教導的那樣——犯了死罪？有關這些問題所說的、在講道中所教導的、所寫的引起了許多困擾，唯有教會最高權威才能給予一個明確的回答。在這封牧函中可以找到這樣的答案。教宗說：在中國有一個天主教會。讓中國教友平安地共慶感恩祭。」（註 28）

韓德力再提到：「教宗敦促那些被聖座任命的官方主教將他們的任命公開化。顯然，他們在過去沒有使其明朗化。而對於那些沒有得到教宗任命的主教，他沒有說任何危言聳聽的話，但他請他們現在闡明和伯多祿繼承人的關係。教宗也鼓勵地下主教們去申請政府當局的認可。教宗說，對天主教會而言，地下教會『並非屬於教會生活的常規』。現在，中國的所有主教必須合一，使羅馬最終能夠正式承認既存的中國主教團。迄今為止還不能正式承認中國主教團，是因為地下主教們不是中國既存主教團的成員，而且中國主教團的一些成員並非由羅馬任命。」（註 29）

韓德力談到牧函中教宗籲請政教分離的原則：「在愛德和真理中的一種政教關係，而這種關係有在公開對話中才能得以實現。但是，教宗提出了從教會角度而言沒有商量餘地的一些要點。設立一個獨立於聖座的教會，與天主教的教義是不相容的。主教必須由伯多祿繼承人任命這一原則對教會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有教宗的委任才能確保教會的合一及主教們的宗徒傳承。這些任命不帶絲毫政治特色。教宗也提到了在國際上被廣泛接受的文件，那些文件闡明：由教宗行使的天主教主教的任命是真正的宗教自由的一個部分。」（註 30）

註 27. 參考韓德力〈開啟中國教會歷史的新篇章—對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國教會牧函的反思〉

註 28. 同註 27.

註 29. 同註 27.

註 30. 同註 27.

韓德力觀察中國教會地上與地下之間所產生的問題時指出，中國人需要有一個彈性的空間來緩衝，但是有些地方是應明確的，「就如中國教會極需的牧靈指導一樣，也需要明確：政教關係中哪些是可以討論的、哪些是沒有商量餘地的。如果教宗沒有澄清這些問題，某些人就會對此加以批評。但是，教宗再三申明，他希望並相信：通過對話，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得到澄清、達成一致。作為一個具體例子，教宗援引了過去五十多年間由政府進行的中國教區新的劃分，這樣的劃分以前從來沒有和羅馬達成過一致。教宗說：在時機恰當並且有益時，可以就此問題進行討論。」（註 31）

最後，韓德力認為：「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十九世紀的事件進行道歉的信一起，這封牧函無疑是羅馬寫給中國教會的最重要的、最具歷史意義的一個文件。此牧函的關鍵詞彙是：和好、合一及對話。教宗在此牧函中沒有一處是號召對抗的。教宗的牧函開啓了：以教會內部的和好與合一、以在平等互敬的基礎上與政府當局進行對話為標記的中國教會歷史的一個新篇章。」（註 32）

整理韓德力的解讀我們看到：

- (1) 教宗牧函的出現，主要因為它對二十年來導致中國教會內部分裂的一些炙手的牧靈問題作了明確的回答，在過去一切令人困擾的討論之後，唯有羅馬才能加以澄清。（針對中國教會牧靈問題做出澄清）
- (2) 在中國有一個天主教會，她是忠於聖座的，可以讓中國教友平安地共慶感恩祭。為此，官方與地下兩個團體的主教、神父可以共祭，首先可以信仰的宣誓來表達合一。現今沒有理由在中國繼續持守一個地下教會團體。因此，教宗收回過去賜予中國地下教會團體的所有特權。中國教友也可以參加官方教會團體的司鐸主祭的感恩祭。（一個中國教會，忠於教廷，合一共祭）
- (3) 教宗敦促那些被聖座任命的官方主教將他們的任命公開化。現在，中國的所有主教必須合一，使羅馬最終能夠正式承認既存的中國主教團。（主教任命公開化，最後所有主教合一）
- (4) 在愛德和真理中的一種政教關係，而這種關係有在公開對話中才能得以實現。而由教宗行使的天主教主教的任命是真正的宗教自由的一個部分。（確定政教分離原則）
- (5) 中國教會地上與地下之間所產生的問題時，顯示中國人需要有一個彈性的空間來緩衝，但是有些地方是應明確的。.....

註 31.同註 27.

註 32.同註 27.

教宗強調通過對話，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得到澄清、達成一致。（通過對話與中國協調，以產生共識，解決問題）

- (6) 教宗的牧函開啓了：以教會內部的和好與合一、以在平等互敬的基礎上與政府當局進行對話為標記的中國教會歷史的一個新篇章。（牧函就是對中國政策最新與最根本的依據）

2. 《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的修正：

對於教宗的牧函，中國政府一開始就是採取封殺的動作。不過，牧函在大陸教會無論地下或地上都已經產生回應，然而，部分地下教友還是有疑慮：牧函給所有神職人員最直接的任務就是全力傳播「修和、合一」信息並助長中國教會內部的合一。有些被教廷認可的官方主教複印了教宗牧函給神父，要求他們明確研究並遵行，例如上海、汾陽、景縣、寧夏等地。而地下主教東北齊齊哈爾四平的主教魏景儀還寫了牧函歡迎教宗的呼籲，保定的地下主教安樹新也告訴友人，他早就已經開始走合一之路，追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引導了。對教友來說過去他們與神父，甚至這兩位主教之間都曾存有很大的歧見，「現在教宗的牧函對他們會而言，是走向合一之路的全新開端」，可是對他們來說牧函中某些地方還是難以接受。（註 33）

從韓德力的觀察來看，部分地下團體的成員仍然認為某些情況避免與公開團體的人一起舉行共祭，因為「政府當局對待教友的不義，使他們有理由以一種分開的地下『教會』繼續運作。」在若望保祿二世時，「他一方面耐著性子，尊重中國兩方教友團體各行其道，他如此不厭其煩，以致使更正式的呼求合一之聲，經過多時才能產生出來。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從未停止過強調邁向合一與修和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也從未停止呼籲政府勿再侵基督徒。本篤十六世怕一些官方主教與神父，在公開表達與聖父合一而受到當局的處罰，牧函中引用耶穌對門徒所說的：「放心，是我，不必害怕！」做為鼓勵。至於地下團體的猶豫遲疑是人之常情，可是若因此而逃避合一的呼求，甚至再倒退回到「八條指示」，「這無異承認中國教會內部分歧為兩個團體...凡認可地下的猶豫，便造成中國教會內困擾。他們要承擔削弱教宗牧函訊息的沈重的歷之責，他們給了信眾模糊不清的信息。」「...教宗的信好像音樂已經譜好了曲，有了詞也有了調，也就是他的精神和他信的意義都充分表達了。所有關心的人都必須避免提出不一致註解，以免造成中國教會之間的困擾，使他們不聽誰的。」（註 34）

註 33. 參考韓德力〈忠心執行教宗致中國信眾牧函的精神與意義〉。

註 34. 同註 33.

儘管韓德力是如此解讀，可是化解地上與地下的「心結」顯然不是一步就可到位。更麻煩的是對教宗牧函解讀／反解讀，竟然一下子又相互對立起來，使得教區神職人與平信徒在面對教宗牧函時常會有不知所錯的感覺。有一位甘保祿神父他就提到：

「.....從外面看中國教會時，許多人也許會覺得一些問題完全可以按照他們那樣的思路和想法得到解決，所以常常會因為中國教會的神長教友們並沒有完全聽從他們的意見和建議而感到失望難過。但如果面對歷史的話，我們首先應該承認的是，造成中國教會目前多種困境和難處的原因，除了毋庸多言的政治和文化因素外，許多海外教會機構和個人不明智的言論及舉措也難辭其咎。遠到『禮儀之爭』時代不同修會之間的鬥爭，近到上個世紀八零年代末、九零年代初『橋樑教會團體』之間的不同意見和聲音，現在的《解讀》及『反解讀』.....諸如此類，都讓中國教會內部的弟兄姐妹無所適從，形成剪不斷、理還亂的僵局，而最後受害最大最多的還是身陷其中的中國神長和教友們。」（註 35）

明顯地我們看到教宗牧函的確有一些效果，影響也出現。不過，儘管本篤十六世想要以這封牧函為前進中國的最依據，然而不是他與他的團隊對中國與中國教會的不夠了解，就是「前進中國」的速度太快，讓中國這方面無法馬上消化。更重要的關鍵是加速中梵建交對中國內部與教會有何益處？從甘保祿上面的披露，可以看到中國教會本身的衝突一直都在，這個衝突使得地上／地下教會之間不斷「舊仇加新仇」，讓彼此的傷痕很難「癒合」。這個衝突的根源還是來自中國政府的領導與它的宗教政策。

自中共在 1949 建政後，宗教自由被列入《中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總綱第五條，不過「隨著新中國政治路線的左右變幻，宗教政策也跟著一路顛簸。」（註 36）1951 年 3 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積極推進宗教革新運動的指示〉，要求各地黨組織「團結宗教界最大多數，組織、發展和鞏固全國宗教界的反帝統一戰線」，在政治上割斷與帝國主義的聯繫，實現「自治」、「自傳」、「自養」的教會體制。（註 37）「三自教會」的體制與精神確定，和「帝國主義」切斷一切聯繫或趕走一切帝國勢力的政策也在此時開始執行。

註 35.義大利天主教雜誌《三十天》（30 Giorni）對保定教區安樹新主教及香港教區已退休的陳日君樞機的評論，引發境內外教會人士的爭議。筆名「甘保祿」的一位大陸司鐸撰文〈中國：也談「保定的問題和教宗的牧函」〉呼籲境外教會人士能調和他們的觀點，不要展現給中國教會看到他們因不同意見而產生矛盾。

註 36. 參考南懷仁文化協會編（2006）《中國教會的今天與明天》中金以楓〈中國共產黨宗教政策發展述略〉頁 36。

註 37.同註 36，頁 39。

香港學者刑福增在他的《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一書中，用了四個章節來描述與反省這段歷史：

第一章 反帝愛國—建國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

第二章 打掃房子—一九五一年的基督教控訴運動

第三章 連根拔起—建國後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的終結

第四章 中國關門—來華傳教士的撒離與反思（註 38）

協助世人了解這段血淚的「教難史」，而最重要的結果就是「中國關門」拒絕了來華福傳的基督宗教傳教士，成了一個封閉的「自治、自傳、自養」的中國教會。

文革十年浩劫更是對中國各大宗教信徒與教友們最無情的破壞與傷害，中共的宗教政策受到無情的干擾與破壞，宗教自由蕩然無存。一直到鄧小平復出，啟動開革開放，他強調：「就是要調動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爲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鬥。」（註 39）在這種精神下，中共中央重申：在世界觀上，馬克思主義同任何有論都是對立的；但在政治行動上，馬克思主義者和愛國的宗教信徒卻完全可以而且必須結成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共同奮鬥的統一戰線。」（註 40）

問題是這麼多年下來，宗教如何與社會主義相互適應呢？90 年代以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老鄧的接班人們意識到「民族、宗教無小事」，相互適應是必須要走的路線，可是六四、法輪功的教訓也讓江澤民等有所警惕：「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制止和打擊利用宗教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堅持抵制境外宗教敵對勢力和滲透活動。」（註 41）中國是在逐漸開放，可是在這股開放洪流之中，對宗教卻又出現了「緊抓」的逆流。這也就是我們看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自 1995 年開始認真動「面向中國」時，中國內部反而出現了對抗與回到文革立場的聲音，破壞中梵進行復交的工作。

事實上，到現在爲止中共的宗教政策還是無法拿捏住左右分寸，這也就是積極如本篤十六世，努力不懈地想要「前進中國」，但是中國內部的這種偏左或偏右的擺動不定，就成了最大的障礙。

由於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始終不定，中國教會內部本身對立一時無法解開，再加上教宗一下子就撤銷了地下教會「所有特權」要求與官方合一共祭，沒有緩衝或配套措施，讓教宗牧函發出去後，產生了「解讀／反解讀」的新對立，使得

註 38. 參考刑福增(2008)《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

註 39. 同註 36，頁 41。

註 40. 同註 36，頁 43。

註 41. 同註 36，頁 44。

「前進中國」的路反而變得更曲折。這是本篤十六世與他的中國問題研究委員會最難理解的地方。

不過，既有問題與新對立，還是需要排除與解決，於是對於牧函的修定成了這幾年來最重要的工作。2009年5月23日教宗批准了《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綱要》。「來自中國的消息表明，教宗的文件不僅促生了各種指向深化其內容的研討會，還推動了許多牧靈活動：這封信正在成為解決天主教會團體所面臨的教義、實施和紀律方面等各種問題的可靠參照。」綱要是在牧函推出兩周年前推出，同時「依照天主教要理問答的體裁，重申教宗本篤十六世所闡述的基本要素」。促成教宗更具體與濃縮的方式來提供給中國教會與天主教徒，這個推手就是陳日君樞機。

3. 《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的補充：

教廷除了發布修正《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的《綱要》外，更在2009年11月10日由教廷國務卿塔爾齊西奧·貝爾托內(Tarcisio Bertone)樞機發表了《致中國天主教會全體司鐸信函》(註42)，做為教宗牧函的補充。

信函中指出「儘管仍存在著種種困難，但從中國各地傳來的消息也顯示出了希望的跡象」，因此與中國對話、溝通和推動中國教會內部合一共融的務，仍將持續與堅持下去，「我願意強調天主教會團體內部的和解以及與民事當局的對話——相互尊重的、建設性的、不放棄天主教信仰原則的對話。」

註42. 繼教宗的《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與牧函《綱要》之後，這篇是第三篇重量級的信函。貝爾托內樞機一開始就強調：「我們正在善度的教宗本篤十六世為紀念聖衛雅「在天之誕辰 Dies Natalis」一百五十周年而賜予我們的司鐸年，令我特別向你們這些在中國的教會的司鐸們講話。」聖若翰·衛雅(St. John Mary Vianney)於1786年出生於法國里昂鄉下農家，正值法國大革命的混亂年代，王室被推翻，國王和王后都被送上斷頭台，新政府無理地規定教會財產歸公，神職人員必須向國家宣誓效忠，以至忠貞的神父只能偷偷地舉行聖事。1801年法國教會與政府在簽訂協約，歸還教會應有的權利，如任命神職人員，於是忠貞的神父返回本堂。(年輕的衛雅見到了當時法國地上與地下教會的合一)。被派往一小聖堂，他在此服侍42年沒有離開，讓全村從冷淡教友變成熱心，魔鬼為難他，最後還是敵不過他對耶穌的信仰與愛，74歲蒙召。教宗庇護十一世於1928年4月23日立他為普世神職人員的主保，尤其是全世界堂區主任司鐸(本堂神父)的主保。2010年正逢衛雅神父逝世150周年，教宗特別以2010年為「司鐸年」，用意提醒教友：本堂神父的重責與價值，而衛雅所處的時代法國地上與地下教會合一的歷史經驗未嘗不是可以提供給中國教會做為參考。

至於對教宗牧函的影響，國務卿貝爾托內指出：「我覺得，在教宗信發表僅短短兩年後就作出最終的總結還為時尚早。用偉大的中國傳教士利瑪竇神父的話說，我想，可以說現在仍然是播種而非收穫的時節。」（註 43）也就是說教廷上下，對於前進中國一直都保持著「積極、進取」的態度。但是能否全然實現或重大突破，還需要有一段時間，所以如今還是只有努力播種耕耘。

信函中對處理「從分裂走向合一」的問題上特別著墨：「在致格林多人前書中談到有關當地團體內部存在的分裂問題時，聖保祿曾寫到：『在你們中間原免不了分黨分派的事，好叫那些經得起考驗的人，在你們中顯出來』（格前 11:19）。一切都是天主安排的、是天主計畫的組成部分，使一切都為他的全能——即上智和無限的愛服務。此時此刻，任何人都不要怕採取具體行動尋求和解、向那『怨你的』（參見瑪 5:23-24）兄弟伸出手來。為此，就迫切需要重視平信徒、司鐸和修女的人性教育。因為，缺少人性方面的成熟、自我控制及內心世界的和諧，常常是導致天主教會團體內產生誤解、缺乏合作及產生衝突的原因。」（註 44）希望中國的天主教徒都能夠「不要怕採取具體行動尋求和解、向那『怨你的』兄弟伸出手來。」顯然在大陸教會兩大團體在修和與合一的進程中遲遲無法有所進展，這也是教宗牧函很難全面推動的重大問題所在。

肆、本篤十六世「前進中國」政策檢討與反思

總的來看，本篤十六世的「前進中國」政策是接續若望保祿二世的「面向中國」的突破。從 2005 年接位之後，他便致力推動這個政策，藉著 2007 年《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跨出歷史的新的一大步。五年多來，中梵關係還是無法明朗化，重點的關鍵當然還是在中國政府與官方的愛國教會，在宗教政策上的不確定性。還有兩岸從陳水扁總統的對立，到了馬英九總統的緩解對立，變化非常快，變數也一直都在進行。中梵台三方想要單獨雙邊進行和解對談，都會出現各自的問題，因此從 1995 迄今，中梵建交的傳聞不斷，結果卻遲遲難行，政治上的牽扯無解，這是主要原因。

註 43. 利瑪竇在中國的成功傳教經驗，一再地被教廷引用，這篇信函中也引出來，特別是在「時間表」上，強調，不是短期就可以看到教宗牧函的全面實現，需要時間，更需要愛心與寬容和相互信任。當然這也反顯出：中國教會內部合一的確出現了強烈的反彈。地上與地下教會的合一共融真的還是需要更多時間來調整。信函全文參考梵蒂岡官方網站 <http://storico.radiovaticana.org/ci1/storico/2009-11/335019.html>。

註 44. 國務卿貝爾托內樞機特別邀請神父與教友一起採取具體的行動向「怨你的」兄弟，這個具體行動基本的還是合一共祭。詳細內文同註 43。

不過，中國內部從中共的宗教政策到愛國教會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上，始終不能做到「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政治操作過度地宰制信仰自由，也無形中增添了中國教會中的分裂。分裂的教會在教宗牧函的修和合一呼籲下，是有重新走向共祭共融的合一傾向，偏偏政治始終不鬆手地在背後操作，讓本篤十六世的美意，反而出現不同的「解讀」，徒增沒有必要的爭議，反倒是讓牧函基本義涵遭到扭曲，具體行動遲遲難行。這也是使得「前進中國」無法直線進行，還得迂回曲折地轉進，中梵建交的真正阻礙還是來自中國內部的難以合一。

事實上，教宗的牧函，還有很多問題，下面就是我們要提出來的反思與質疑：

(1) 台灣問題根本不提，牧函無法全面解決「中國問題」：

教宗牧函的重點就是：中國教會的合一。地下教會長期受到打壓與中共的官方愛國教會形成對立，如今透過這封牧函，中國地下與官方教會應朝密集對話、尋求和解，進而形成一個合一的中國天主教會，再由這個合一的教會來和中國當局爭取更大的宗教自由。牧函是本篤十六世與相關神長集眾智而形成的最新「中國教會處理方針」的話，然而教宗所謂的「中國教會」所涵括的意義與範圍在哪裡？

在教宗牧函中並沒有觸及到港澳與台灣，特別是台灣在一個有充分宗教自由的國家中，卻因著兩岸的政治性問題，使得台灣變成什麼都不是，台灣教區的教友好好像隨時都有可能被犧牲。一旦中國大陸的兩個教會融合為一，是不是就是把台灣、港澳也「加入」這個「中國教區」，還是形成另一個「中國教會」，顯然這個問題並沒有被特別地注意，這不但不公平，而且根本沒有解決問題，日後反而會生出更多問題來。可惜，牧函與日後相關的補充都只針對中國，台灣的角色與地位，隻字不談。沒有全面性地來觀照整個包括台港澳與中國的相關連動，後面的問題將更複雜與難料。

兩岸問題本來就是複雜與變化多端，若是沒有做出相對等與特別地思考的話，就會像處理 2008 年聖火來台等問題一樣，隨時都有風波與問題出現，更何況中國當局對台灣的打擊完全是「全力以赴」「全面撲殺」台灣的生存與發展空間。雖然馬英九總統 2008 年上台之後，兩岸出現緩解。不過，變數還是很多。因此，在處理兩岸的任何關係時，不能只偏向某一邊。同樣對處理中國問題，不談台灣或刻意忽視台灣，更是無法全盤解開整個中國問題。

一個合一的中國教會當然是教廷與眾人所樂見的，但是這不是說說就可以共融與合一的，沒有對兩岸與對中國深入地了解，就有可能「簡單地相信」這個合一是可以立即執行成功的。如此一來，很可能就會在無形中幫了中國當局一起來

打壓弱勢弟兄（特別是大陸的地下教會教友與台港澳教區教友），反而會破壞了教宗推動一個「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在中國出現這樣一個美意與用心。

(2) 強調中國教會合一，卻無完整合理的方法化解冤仇：

牧函顯然鎖定的是中國大陸的地下團體與官方教會，想把台灣問題放在以後再說，以這樣定義下的「中國教會」，「...教宗鼓勵他們首先以信仰的宣誓來表達他們之間的合一。教會在地下生活不是正常的情形。現今沒有理由在中國繼續持守一個地下教會團體。因此，教宗收回過去賜予中國地下教會團體的所有特權。中國教友也可以參加官方教會團體的司鐸主祭的感恩祭。」（註 45）

地下教會團體的特權就是依著若望保祿二世的「老八點指示」而給予的，因為官方教會與中國當局對天教友的迫害打壓與不公不義，對這些身處大陸地下教會的主教、神父與教友們一個安慰與支持，如今由牧函取代，而牧函的重點就是取消這些特權，要地下團體「回歸正常」。走向地上與官方教會團體一起共祭，而參與這個共祭地下團體教友是不會再像以前范學淹主教所立下的「十三條指示」--所稱「犯了大罪」。看起來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特赦，對中國地下團體的成員應該是教宗本篤十六世最直接的聲援與支持的善意表現。只是為何這些地下團體的成員還是心有疑慮呢？遲疑不前呢？

這個疑慮明顯地不是來自對教廷與教宗本人的不信任，反過來說，應該是針對中國當局與愛國教會的不信任所產生出來的。自從中國共產黨建政以來，多少次的運動與革命，那一次最後的結果不是人民受害？生活在整個共產主義氛圍中的人民，早就了解到政府是不可靠，在一黨獨大的社會，只有共產黨的話才是真理，誰敢堅持自己所說的是真的而與共產黨相違背的話，結果就是遭到最悲慘的命運，試問誰敢再說真話？而為了生活，應付黨應付其人的生存之道應運而生。不甘受辱又不願違背良心與天主的人們，被迫選擇走向「地下」，唯一的心願不就是等待有一天能夠重回光明，真正可以自由自在地歌誦天主，能夠在自由光明的氛圍下與其他弟兄姊妹們一起舉行感恩聖祭。

如今牧函在認真地釐清許多問題上下了不少工夫，可惜的是對於共產社會長期鬥爭的歷史與經驗顯然了解不夠深入，以至無法深深體會這些在地下教會成員中長期的煎熬與憂苦，自然難以理解：為何有人要對教宗這樣的牧函心存疑慮？

依著韓德力的觀察中指出「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審慎研究大陸教會情況之後，認為跨越『八點指示』情結的時機成熟了」這封牧函便是教宗給等待已久的人一

註 45：這段文字是韓德力對教宗牧函的解讀，參考同註 33。

個清楚的答案。的確「八點指示」是過時了，牧函是新的指標，可是在樹立新指標之前的「審慎研究中」有沒有把地下教會中的疑慮納入其中來考量呢？因為這也就是他們在接到聖座牧函之後，反彈最大與最多的地方。

本篤十六世並沒有生活在「地下教會」的經歷，韓德力也未曾有過類似的經驗？若是有的話，應該可以理解他們的心中疑慮，不是共不共祭的問題而是與我們一起舉行共祭的官方團體和他們後面的政府當局是否值得信任？共不共祭的前提在能否相互信任。沒有這份信任，如何可能產生共同的感恩與共融的情誼呢？所以若是認為這些地下團體「若是再重回老八條，就是坐實了裂教的罪名」不但扣得太快了，同時對這些一直向梵蒂岡教宗效忠的教友來說也太不公平、太殘忍了。

牧函強調的修和，是讓地下教會成員走出地下，過正常與光明的教友生活，可是地上與官方教會並不是完全誠心誠意地歡迎地下教會的神職人與教友，甚至還有繼續再打壓地下教會成員的動作。梵蒂岡沒有在這方面做出相關的配套措施，就撤銷地下教會所有特權。如此一來，地下教會若不修和與地上合一，就是觸犯了牧函，或被責怪為推動中國教會合一的「大石頭」（或罪人）。拿走地下教會所有保護他們信仰的傘，讓他們暴露在大雨中，反過來還責怪他們擋住了雨勢，這是說不通的。

（3）教廷推動合一共祭 忽略關鍵還在中共與愛國教會

大陸的地下團體，不是沒有人試過要與地上的官方團體進行溝通與合一，下面這個經驗也可供我們反思。曾有一位地下教會神父在了解合一的必要時主動地向愛國教會投靠，願意成為他們與地下教會的橋梁，可是在經過最後的共祭這個儀式時，竟然發生了主禮的主教（這位官方主教也是被教廷所認可）不願意出席，讓副主教來主持，但是副主教也刻意稱病，如此一來這樣的共融共祭儀式，只得由他和愛國教會本堂神父一同舉行，中國當局幹部則一直在旁「督導」，整個共祭與共融落得是一場鬧劇。不但變得形式化也變得相互之間根本沒有信任的存在，這位地下教會的神父，最後落得是不但地上教會不理會他（他的表現比愛國教會還要愛國與積極，讓官方反而害怕與防他），地下教會更是刻意疏遠他（他出賣了自己，更重要的是在投靠愛國教會時不斷地打壓、分化地下的兄弟姐妹們，造成大家都不願意再接納他），兩面不是人。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來，想要在現在這個時候讓地上與地下兩個團體馬上進行所謂的共祭儀式是有問題的。如何去化解彼此之間這樣深的鴻溝，可能需要更多有信德與愛德的主教、神父與教友一起來參與，並且坦開心胸，認真地對話，從對話之中到彼此交集，再從這個交集來進行更多交流活動，再進一步地談到共祭

共融這樣的大事，應先做好彼此對話的準備，可能比要求地下教會立刻「走向地上」與官方教會共祭，更實際更有用處。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提到他當年如何處理中國教會的問題時，指「他一方面耐著性子，尊重中國兩方教友團體各行其道，他如此不厭其煩，以致使更正式的呼求合一之聲，經過多時才能產生出來。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從未停止過強調邁向合一與修和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也從未停止呼籲政府勿再侵擾基督徒。」（註46）看起來若望保祿二世好像是「耽擱」了兩個團體正式合一的關鍵人物。然而，教宗為何要耐著性子尊重中國兩方教友團體各行其道？能夠在他口中一句話就合一的話，為何教宗還得耐著性子而不下聖諭呢？問題好像不是在於他，關鍵還是在中國當局與官方教會。

若望保祿二世自己從波蘭出生，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入侵與後來蘇聯的解放，他有著豐富的地下教會經歷，更有多次與共產政權交手周旋的經驗，早在若望保祿二世在波蘭共產黨領政時，他被教區主教提名為助理主教時，獲得了教廷的承認，但是在升任總主教時，波蘭的主教長維辛斯基在給政府核可的名單上並沒有提名他，他當時在大學任教，被共產當局視為浪漫而只談愛的傢伙，是他們用來打擊強硬的維辛斯基主教最好的「利器」，所以共產政府駁回維辛斯基的提名單，逕自填上「沃蒂華」的名字，還形式上地拿給維辛斯基簽字，維辛斯基主教明顯地了解到唯有這樣做才有可能保留「沃蒂華主教能夠順利接班」，聰明地和共黨周旋，這個模式之間可以看得見的是人心的險惡與盤算，看不見的卻是天主早有最佳的安排，祂早就揀選了沃蒂華做為日後天主教會最大的磐石繼承人。

如今在中國自祝自聖的安排下所產生的主教，很多是經過共產黨中央通過的人選，形成中國愛國會的主幹，雖然這幾年來教廷與中國之間為了主教任命的問題開始有爭執，也有所謂的事後認可的情況，顯示出本篤十六世繼任教宗之後雙方的關係是有改變。然而這種改變，還是無法讓地下團體的信眾完全相信。這也就是為什麼疑慮一直都存在。

本篤十六世的團隊中有些成員與愛國教會多有接觸（韓德力就是其中的一位），可是對地下教會與這些成員們等待著光明與中國當局所做的苦心應對似乎了解不多，以致於對若望保祿二世為何要「耐著性子」來面對中國，不但不解，更有著不太諒解的感覺在。這一點真的是非常可惜，若是能夠再深入體會地下教會的心聲，就不會說出「以致使更正式的呼求合一之聲，經過多時才能產生出

註46：引韓德力對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說法，參考同註33。

來」。的確本篤十六世的牧函是跨越舊時代的新指標，可是沒有若望保祿二世如此苦心孤詣地、不厭其煩地教誨與容忍，很多悲劇可能早就發生了。沒有去體會這段歷史與這段歷程，顯然在對他本篤十六世的建言中，很可能只提供了一面之見（即對愛國教會這方面的理解），少了地下教會的心聲與對他們的體會。

（4）對中國的宗教自由 不能一廂情願地存有太多幻想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兩個教會合一和中國政府的對話，牧函與各種的「解讀」，一再強調地上地下兩個團體的修和與合一，進而能夠形成所謂一個完整的中國教會，但是這並不是一加一的問題，也不是混合就能成為同一的問題。只要有一個合一的中國教會就可以向中國當局爭取所謂的宗教自由，的確是很好的構想與遠景，只是這麼多年下來，兩個團體本來就不是完全信任對方，想要因著教宗的一封牧函就立刻走向對話而修和進而合一，相信這是需要技巧與時間，更重要的是需要彼此的相互信任，才有可能進行下一步。

至於在和中國政府做出密集對話，這個議題上，本篤十六世的團隊顯然不太了解中國政當局（共產黨至今還是深信無神論）是一個怎樣的政府。這麼多年下來，為什麼到現在為止，大陸還在不停地打壓地下教會與所謂信徒，特別明顯的就是法輪功，在六四天安門同時間法輪功出現，六四大屠殺之後，講求第五個現代化—政治自由—就被迫噤聲，人們不敢多言政治，那麼唯一可談的不就是保命之道，法輪功強調「煉功」轉法輪追求長生，便在這種氛圍下吸引了成千上萬，甚至共產黨員加入，信徒最多時號稱上億。可是在「煉功師被捕事件」下，1999年教宗李洪志發動「425包圍中南海事件」，一天之內上萬法輪功成員就集合在北京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重心所在—中南海—驚動了江澤民，他怕又一個六四再度出現，於是法輪功被打成「邪教」憲法上明定了的邪教，同年七月發動鋪天蓋地的打壓行動，無情地要在三個月內將法輪功永遠斬草除根，這樣的政府，有沒有可能給予他的人民宗教完全的自由呢？（到目前為止，中共對打擊法輪功還是不遺餘力，沒有停息。）

還有在無法完全相信中國政府之前，教宗牧函當然還是處理中國教會事務的基本準則，然而是否也要注意中國政府是如何來對待境內所內宗教信仰的處理，是否真的全面走向宗教自由化？若是沒有做到，反而還像鎮壓法輪功一樣地處理信仰問題的話，這樣是否真有可能進行密集與密切的對話呢？教廷是否也該注意到凱撒雖然歸凱撒，凱撒會不會濫用權力要求人民只准「信奉政府」？

本篤十六世的團隊中有人注意到「中國教會過去廿五年來，得以重建且迅速擴展，部分歸因於政府的默許。」（韓德力就是持這種看法）宗教信仰自由原本就人權之一，中國政府在這方面還是有非常惡劣的記錄，把這廿五年來大陸教會

得以迅速發展歸分歸因於政府的默許，這樣的默許是消極的，並非積極與開放的讓人民有自己真正的信仰自由，換言之，中國當局隨時都可以放出這個默許，自然也能夠隨時緊縮這個權力，可是教廷卻不能對自己的神職人員放手不顧任其自生自滅或者任其遭到打壓與迫害。牧函在向所有中國天主教發送之際，是否真的也考慮到所有中國的天主教會兄弟姐妹們真正的處境？

若是能先為他／她們著想，相信他／她們對於教廷的向心不但更堅定，對教宗的向心更是不言而喻。能夠看到中國教會的合一，與「唯一、至聖、至公，宗徒所傳下來教會」共祭共融，這當然是好事。只是從教宗牧函頒布之後，竟然引發出這麼大的爭議，讓我們不得不再深思熟慮一下，中國教會的問題，很可能不是單方面教宗與教廷方面做出自我約束與要求就能得到圓滿的解決，牧函只是一個善意的起點，到現在為我們看到了地下與官方教會有部分的回應，更多的疑慮還待釐清。

所以在疑慮尚未釐清之前，都應該保持開放的心，不要扣帽子也不要立刻就批判，多聽大陸地下團體的聲音，也許會找到最佳的溝通起點，做出更有建設性的修和動作。至於中國當局，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見對教宗牧函的善意回應，對話的門永遠敞開，但是信任，相互的信任必須進來，才有可能產生更多可靠的信賴與對談，有這樣信賴的對談，修和與合一的中國教會才真的指日可期。

(5) 牧函是個好的開始，行動細節還待坦誠互信來處理

最後，談到執行教宗牧函的細節與具體行動時，陳日君樞機在〈讓我講兩句不討好的話〉一文中，提醒世人「...在解決問題細節時，人人都應該以最坦誠的心在信（教宗牧函）中找到啟示」「不符合這信的任何解釋，會破壞那可貴的平衡，也就辜負聖父的苦心。」（註 47）

不過，陳日君也指出：「其實教廷在八十年代已給了這樣的指示，不過，這次是教宗親自清楚認同這指示。地下的神父們不能禁止教友們去參加聖事，更不該說那是罪惡。」（註 48）（這就是這封牧函的重點與跨越「八點指示」的關鍵）

註 47：就在韓德力發表於台灣天主教《教友生活周刊》2007/9/9 第 2724 期第五版的一篇〈忠心執行教宗致中國信眾牧函的精神與意義〉同一個版面上也刊出陳日君樞機的這篇〈讓我講兩句不討好的話〉。對教宗牧函有著不同角度的看法與解讀。

註 48：參考同註 47。

然而接著陳樞機就提到：「但這裡我也想指出，參加『與伯多祿繼承者完全的主教、神父的聖祭或聖事』不必猶豫，參加『尚未與教宗共融者』卻是有條件的：『如果有嚴重的不便參加與教宗共融的主教和司鐸主持的感恩祭和其他聖事。』兩者之間有分別的。」（註 49）明顯地他看到了地上與地下教會之中的差別與疑慮所在，這是不能勉強，需要時間與愛心來溝通與修和的。

陳樞機還提醒我們：「教宗的信我們該詳細的看，不能太樂觀地說，現在跟誰都可以共祭了。教宗很寬容體諒，但他不能不向他的子女有要求。」所以教宗並沒有「鼓勵」地下教會都上來，本篤十六世強調「讓個別主教，按地方情形去抉擇。」而「主教在作出決定前，要『聽取神父們的意見，決定後，教宗希望神父能接受。』...教宗在這裡勸神父和主教修和，大家努力，在已形成的新形勢內，團結爭取真正的宗教自由。」（註 50）

看得出在爭取兩個會合一之前，各自教會內的修和與合一也是很重要的問題需要一一地去處理，有了更多的共識與共同努力後，相信中國教會的合一會更快來臨，「此（修和與合一的）路途不可能一日之間完成。」所以說，在牧函發表之後，出現更多的討論與爭論，並不代表是壞事，這正是讓教內中兄弟姊妹，無論地上或地下，海內或海外，大家一起來共檢查，有了這樣的基本共識，合一不就更容易嗎？只是在此之前，有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正如陳日君借牧函中所提到的話來與大家互勉：「依從來自聖神內的啓發，寬恕彼此的嫌隙，彼此接近，互相接納，打破藩籬，超越能使你們分離的一切。」（註 51）總之，牧函真的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在信仰生活與修道歷程上，還有更多的細節與問題還待大家坦誠與相互信賴來一一地處理與克服。

註 49：參考同註 47。主教任命權與主教行使職職的問題，其實還是沒有徹底解決，關鍵還是愛國會與中共在背後操刀控制。陳日君樞機在教宗召開的第三次中國問題研究委員會之後，回到香港，2010 年 4 月 12 日時接受天亞社專訪時，他談到這次會議的共識：即主教有責任維護信仰的完整。我認為這是公報最重要的部分，因為它清楚地提醒我們教宗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裏所寫的，顯示妥協要有底線，不能超越。」他更怒轟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指責由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舉辦的天主教代表大會，指大會企圖繼續以官方勢力控制教會，羅馬教會妥協已到底線。陳日君指，教宗已明確指出愛國會有違教會體制，呼籲全體信徒團結一致，推翻愛國會。這個最新的「風暴」隨時會引爆中梵之間的「對抗」。而陳日君甚至直轟愛國會的副主席劉柏年，指「整個中國教會只操控在一名教友手裏，就是一位愛國會副主席，政府在他背後撐腰。近幾年，這位教友在主席職位出缺的情況下，不受制肘地主導一會一團的事務。」

註 50：參考同註 47。

註 51：參考同註 47。

伍、結語

今年三月與一位來自東北的神父談話，他在台灣傳教已經五十多年，才剛回大陸瀋陽與當地的家人和教友共同慶祝他晉鐸五十年金慶。他談到地下教會成員都知道都說要來與他共祭，他自己一直都不知道誰會來，誰不會來。結果當天一位愛國教會的神父硬是要來共祭，地下教會的神父就是不願意與他一起共祭，弄得大家都很尷尬，還是他出來打圓場，完成這段共祭儀式。

來自三個教會，一個共祭儀式讓三個教會都覺得怪怪的，問題出在哪裡？羅馬大公教會不是強調一個教會嗎？為何在教宗牧函發出三年了，中國大陸還有不少地區的教友沒有看到這封信？沒有看到這封牧函的教友是否還繼續生活在原本的信仰生活中呢？

有一位台灣的教友赴大陸佘山聖母朝聖，他說當天台灣的洪總主教也去了，全體神職人員與教友，無論是大陸地上或地下教友，大家一致為教宗祈禱，他說這樣很好啊！在上海你看不出來誰是地上誰是地下教友，大家都是一個樣，追求天主，信仰基督。為何上海可以共祭共融，但是瀋陽卻有問題呢？在大陸信仰還有城鄉差距嗎？原因又在哪？

2010年4月21日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遇到香港學者刑福增等人，談到大陸的地上地下教會，他們也說接觸到的內陸教友已分不太清楚了。至於香港以往的教友是流失的，可是這幾年來又有不少教友回流。香港多年後一國兩制結束時，也將成為中國一部分，「香港教區」不再是一個特別教區，而將和大陸其他教區一樣成為地方教區，這個變化遲早要發生。

從上述種種現象來看，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前進中國政策遲早都會實現，而一個真正合一的中國教會勢必也要出現。只是這個歷程還需要多久？教宗牧函的基本精神是對的，朝修和合一方向邁進也是對的，可是政治的現實性與操作就是隨時會插手進來干預。而政治的現實多半又是以利益為最重要的考量，也因為利害衝突產生更多糾結與心理障礙，使得單純宗教問題變得反而複雜難解。

在研究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中國政策過程，不斷地觸動到「宗教／政治」的問題，中國方面長期以來一直都是堅持兩個原則（教廷與台灣斷交，不干涉中國內政），梵蒂岡的反應是與台灣隨時可以斷交，但是一個合一的教會，包括主教與羅馬主教也要合一，一旦要合一，是要聽教宗的還是聽國家的問題就會出現，這個爭議就是「主教任命權」。不過，本篤十六世在這方面也做了善意的妥協，所以雖然時有所聞有關主教任命的「對抗」，不過，這個爭議雙方也逐漸達成一個新的「中國模式」，然而距主教完全合一，還是有一段路要走。

陳日君樞機在 2010 年 4 月 12 日接受專訪，痛批愛國教會操控今年下半年即將召開的中國天主教代表大會，他強調這個大會就是「就是意圖要公開教會保持現狀，政府將永遠繼續控制教會。顯然，大會將會選出愛國會和主教團的領袖。然而我們知道，這兩個機構的領袖只是傀儡，對教會毫無話事權。」根本之計就是要「取締愛國會」。「現在應該是清晰講真理的時候了，不可以無條件的就妥協，很重要的，我們要配合這個政策啦。以前教宗不出來說話，現在說話了，愛國會是不可以接受的，大家應該一齊團結，去推翻她。」（註 52）陳日君的「不可無條件妥協」的說法是最新的教會反應，後續發展值得觀察。而這個說法已經引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問題：愛國教會繼續坐大，並且幫中共繼續執行「管理宗教」的政策，儼然形成另一個小教廷與梵蒂岡「對抗」。

中共既是所有政策的最後指導者，愛國教會就是它的工具，而愛國教會在教宗牧函一出之後，逮住了教宗呼籲地下教友不要再地下化了，走出地下與官方教會合一共濟。如同陽謀一樣讓地下教會成員「自投羅網」，愛國教會的副主席劉柏年所控制的不只是教友，更要緊的是他藉著中共的撐腰，控制了中國主教團與愛國教會，主教任命權成了他手上的籌碼，可以玩弄中共也可以隨時拿來「對抗」梵蒂岡，教宗牧函也變成他的一個籌碼，讓愛國教會可以挾持威脅神父與地下教會的教友。真的，若是愛國教會不散或退出，中國教會的合一共融的日子只有更遠不會更近。

然而，愛國教會長期在中國的扶持下，享受著巨大的利益，也操縱著不少權力分配，在教宗號召合一，日後真的完成合一之後，愛國教會形同虛設，不再有任何實權更談不上實際的利益，這些長期位居要津的愛國會幹部們，他們會如此輕易地就放棄這一切的「既得利益」嗎？這個其實才是中國內部裡面最容易產生問題的一個環結。與地下教會長期是對立，長期以來愛國教會是「施壓者」，要他們與「受迫的對象」合一，這一點他們能辦得到嗎？

當然，既是基督的信徒，就應該放下有利益跟隨基督，可是說很容易，要做呢？還是有待考驗。只是未來中國問題的走向真的得靠這些人的內心掙扎嗎？

「前進中國」的基本依據就是《致中國天主教徒牧函》，這也是梵蒂岡對「中國問題」處理上「政治／牧靈」上最根本的依據，從來的《綱要》與國務貝爾托內樞機所發表《致中國天主教會全體司鐸信函》，做為教宗牧函的補充，在在顯示教廷的動作只有更積極沒有退縮的餘地。所以他的「前進中國」只有更明確，不會變模糊。

註 52：參考同註 49。並參考 2010/4/12 天亞社中文網與香港《蘋果日報》。

反觀中國，最大的問題除了宗教政策之外，內部上的矛盾會是造成中國與梵蒂岡建交的最大挑戰。中國在一味地發展經濟之際，信仰上的空虛與長期以來對方對於外來信仰的「厭惡」與「掃蕩」，誰也抓不準何時又會緊縮他的宗教自由。

台灣在不斷地傳來中梵即將建交的壓力之下，不少學者專家都在思考台灣可能的出路，像梁潔芬修女與王志堅副教授在 2006 年 6 月 27 日文藻外語學院發表〈從台灣的觀點反省台中梵三邊關係〉最後提出了下面幾項台灣可以著力的地方：

- 梵蒂岡博物館與台北故宮博物院加強合作交流，
- 設立台梵學術及文化交流項目，
- 政府支持橋樑教會的工作，
- 設宗座代表取代駐華大使，主理台梵聯合工作，
- 修改台灣教育法准許教授宗教，提倡倫理道德，提高國民素質。(註 53)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所長郭秋慶教授的〈台灣與梵蒂岡外交關係的挑戰與展望〉結論時提到了兩個重要問題：一是一旦中梵建交，台灣的邦交國僅 25 小國，增加台灣的國計民生與國際地位助益不大，未來使用中華民國稱號，為維持目前台灣政府統治的合法性，較偏向工具性意義。其次，最近台灣極力追求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NGO）像原住民、人權或衛生等機構，這些都是功能性外交作為，像台灣具有主權的「國家」本質，仍無法在國際上實際展現出來，因此呼籲當前政治人物除了爭取全國性選舉勝利，分享權力之外，應該正視台灣政府統治合法性弱化的原因，以及努力促進台灣的國家利益。(註 54)

經過以上對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中國政策探索與分析中，我們發現：其實，台灣在這個時候在政治上真的很難使得上力氣。但是，在宗教上，梵蒂岡終究還是以宗教信仰為主體，台灣的教會與教友們還是有很多可以發揮的地方。未來教會中最缺乏的就是神職人員，愈來愈少的年輕人走進各國與各地的教會中服侍天主，而今大陸是不少年青的修生與修士，能夠對他們發生影響和作用的還是台灣的教會、神父、修女與教友，這些點點滴滴的力量匯聚起來，就有可能對整個中國產生不可思議的力量。所以台灣不是全然處於劣勢。在政治上受到限制，在宗教上就有無限自由的發揮空間，就待台灣的政府與教會一起合作，為我們自己找出影響中國教會最直接與最重要的方法與途徑了！

註 53.參考梁潔芬、王志堅（2006/6/27）〈從台灣的觀點反省台中梵三邊關係〉

豆丁網 <http://www.docin.com/p-12821243.html> 與 SlideFinder <http://www.slidefinder.net>

註 54.參考郭秋慶(2006/3/23)〈台灣與梵蒂岡外交關係的挑戰與展望〉引自

<http://blog.lib.tku.edu.tw/gallery/1/1-212.pdf> 與「聚焦歐盟」網站。

陸、參考書目

(1) 中文論文與書目

- 1.孔令信(2007/7/15)〈教宗牧函所帶來的提醒與啓發〉《教友生活周刊》第 2716 期。
- 2.本篤十六世(2007/5/27)《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信函》, (*Nota Esplicativa*) -(*Versione Tradizionale*)中文版, 輔仁大學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網。
- 3.本篤十六世(2009/5/23)《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綱要》, 梵蒂岡官方網站。
- 4.刑福增(2008)《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 --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香港: 道風書社。
- 5.拉辛格樞機著 房志榮譯(1998)《地上的鹽》台北市: 光啓。
- 6.約翰·艾倫著 宮高德譯(2007)《教宗本篤十六世》台北市: 晨星。
- 7.段琦(2009)《梵蒂岡的亂世抉擇(1922-1945)》北京: 金城出版社。
- 8.南懷仁文化協會編(2006)《中國教會的今天與明天—慶祝韓德力神父七五華誕、晉鐸金慶論文集》台北市: 光啓文化。
- 9.陳日君(2007/9/9)〈讓我講兩句不討好的話〉《教友生活周刊》第 2724 期第五版。
- 10.郭秋慶(2006/3/23)〈台灣與梵蒂岡外交關係的挑戰與展望〉引自 <http://blog.lib.tku.edu.tw/gallery/1/1-212.pdf> 與「聚焦歐盟」網站。
- 11.梁潔芬、王志堅(2006/6/27)〈從台灣的觀點反省台中梵三邊關係〉豆丁網 <http://www.docin.com/p-12821243.html> 與 SlideFinder <http://www.slidefinder.net>
- 12.塔爾齊西奧·貝爾托內(2009/11/10)《致中國天主教會全體司鐸信函》梵蒂岡官方網站 <http://storico.radiovaticana.org/ci1/storico/2009-11/335019.html>。

- 13.韓德力（2007/7/13）〈開啓中國教會歷史的新篇章—對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國教會牧函的反思〉天主教亞洲通訊社。
- 14.韓德力（2007/9/9）〈忠心執行教宗致中國信眾牧函的精神與意義〉《教友生活周刊》第 2724 期第五版。

(2) 英文書目

- 1.A.B.Ch' un-shen Chang, S.J.(1998) “*The Catholic Church in Mainland China*” Taipei: Wisdom Press (Daughters of St. Paul)
- 2.E.Wurth(2006) “*Papal Documents Related to China 1937-2005* ” Holy Spirit Study Centre Hong Kong, China.
- 3.Martin Conway(1997) “*Catholic Politics in Europe (1918-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